

# 傅斯年圖書館藏《萬里回疆圖》 繪製考述——兼述其修復過程



林武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41 期 2023.12

## 前言

「回疆」，在清代文獻裡是對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稱。該地為維吾爾族人聚居之地，因清代對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或地區多稱為「回」，故名「回疆」。有清一代，從入關直至清末，湧現大批記述回疆人文風土、地理建置的著作，其中有文人士子、戍邊官軍的私人著述，也有邊疆大吏為戍邊需要所寫的志書，以及皇帝親自下令測繪編纂的官方著作。學者把這些西行之人前往西域途中或在西域境內，隨手所記之書稱為「西域行記」。在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傳圖」）藏品中，就有這麼一件清代乾隆年間的西域行記——彩繪的回疆地圖：《萬里回疆圖》。<sup>①</sup>

根據史語所檔案記載，此圖於民國三十六年六月，由史語所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託付旅行社運往南京，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史語所圖書室登錄入藏。<sup>②</sup>民國九十二年初，筆者得知此圖卷端劣化嚴重，認為必須進行加固及增強保護措施。同年，本館裱褙室同仁即在老師指導下，按照選定的方案進行修復，並新製一錦盒以為保護，於民國九十三年春大功告成。

本文首先簡單介紹這份地圖的內容梗概，其次則對作者家世、生平做一考證，並敘述作者繪圖緣由及地圖內容、價值，最後則說明此圖的修復過程。

## 一、《萬里回疆圖》的概況

《萬里回疆圖》（以下簡稱《回疆圖》），紙本設色，手卷裝，全長 1,425 公分，高 69 公分。為蘇寧阿（〔1731〕-1805）<sup>③</sup>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紫荊關參將任內所繪，並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加以裝裱的回疆地圖。卷端鈐有「蘇寧阿印」、「壽泉」、「牡丹華（花）樵」三印，惜前二印缺損殆半；卷中段〈萬里回疆圖〉上鈐騎縫章「山向吾曹分外青」及卷末鈐「蘇寧阿印」（圖一）（與卷端「蘇寧阿印」為不同的二印）。



圖一：《回疆圖》卷末「蘇寧阿印」

① 本館舊題《山川影》，據卷末跋語改題今名。

② 根據《史語所檔案》雜 36-69-13 載，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託中國旅行社運書一箱，內有書單一份十四種，其中有《山川影》一束；又據《史語所檔案》雜 36-69-16 載，該處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發函給當時遷址南京的史語所，言及六月十二日託中國旅行社運去遷安紙四大包、書籍一箱；又《史語所檔案》雜 36-48-2 載有書單一份，當時所內負責管理圖書室的那廉君、嚴耕望兩位史語所前輩註明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入 216 號各書，內有《山川影》一軸；又《史語所檔案》雜 36-69-17 載，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五日史語所函覆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告知已收到託運之書。

③ 生卒年為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查詢所得。網址：<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0.6000391520569979>（2022.09.15 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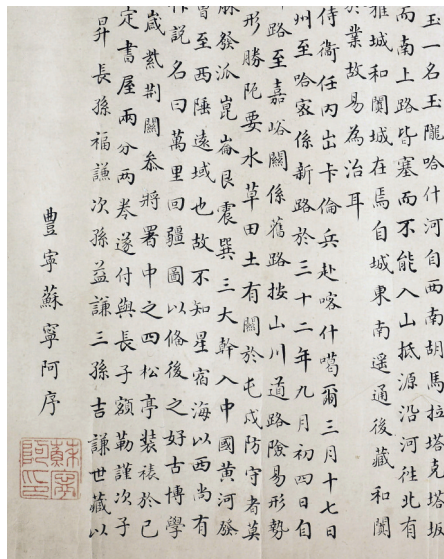


## 二、作者考證

### (一) 作者生平

筆者從相關的清代傳記資料<sup>④</sup>記載中查得蘇寧阿乃蒙古正白旗人，伊普楚特氏。乾隆十九年（1754）由監生恩賞藍翎侍衛，二十九年遷三等侍衛，三十年隨將軍明瑞勦辦烏什回匪。三十五年補授副護軍參領，三十六年補直隸昌平營參將，三十八年調紫荆關參將，四十九年遷通州協副將，五十二年調督標中軍副將，五十四年擢正定鎮總兵，旋調天津鎮總兵。其後於嘉慶四年（1799）擢甘肅提督，五年擢寧夏將軍。嘉慶八年補鑲黃旗蒙古都統。十年十一月卒。又《皇清書史》：「蘇寧阿，字壽泉，號迂庵，滿洲人，乾隆間官天津鎮總兵，善書。」<sup>⑤</sup>

據《八旗藝文編目》<sup>⑥</sup>所載，蘇寧阿著有《恒一堂集》，惟其書名下並未註明作者之籍里字號，但北京大學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仍藏有此一文集清鈔本。<sup>⑦</sup>二〇一〇年出版的《清代詩文集彙編》即收有《恒一堂文稿》清鈔本三卷（存卷一、四、五）及《煙霞錄》、《山居野吟》、《江村野吟》各一卷，皆影自北京大學藏清鈔本。其中《恒一堂文稿·堂亭名號說》便提到蘇寧阿的籍貫、名號等詳實的訊息，並解釋其命名之意，如他自稱「余本古北口外豐寧縣人」、「號靜齋」、「堂名恒一」、「別號鶴峯」、「故宅名易岫山房，房側建小亭名義亭」、「字壽泉」<sup>⑧</sup>等等。據此可知蘇寧阿在《回疆圖》卷末所署「豐寧」（圖二）即指其祖籍，他在某些著作為人作序時，也多署名「豐寧蘇寧阿」，如劉一明《西遊原旨·悟元子註西遊原旨序》即是一例。又如太華碧雲孫真人所著《修身正印》，蘇氏的序即署「特授寧夏將軍仍兼甘肅提督京北豐寧壽泉蘇寧阿敬誠備序」，更是直接點出豐寧的地理位置。



圖二：《回疆圖》卷末蘇寧阿署名

- ④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第169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三〇〇，〈將帥四十〉，頁34-35。又東方學會編，《國史列傳》（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第35冊），卷一八，頁3-4。
- ⑤ 清·李放纂輯，《皇清書史》（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第83冊），卷六，頁14b。
- ⑥ 恩華纂輯，關紀新整理點校，《八旗藝文編目》（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頁154。
- ⑦ 北京大學藏本稱《恒一堂文稿》，清鈔本，共五集六冊；中國科學院藏本稱《恒一堂集》，但僅存其中三、六、七冊，共三冊。見李靈年、楊忠主編，王欲祥等著，《清人別集總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頁677及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上冊，頁739。
- ⑧ 清·蘇寧阿，《恒一堂文稿·堂亭名號說》（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49。

此外，北京大學藏清鈔本《恒一堂文稿》裡尚有作者其他相關訊息，譬如常見蘇寧阿在文末署名「燕臺蘇壽泉」、「煙霞道人妙參」、「天台採藥道人弟子妙參」、「迂庵若愚」，甚至提到自己的生辰是三月二十四日，著有《心印經釋義》、《八段錦補注》、四弟名「蘇定阿」，此等訊息均散見此藏本各書之中，讀者稍加檢視必有所獲。

## （二）作者軼事

《國史列傳》等傳記資料對於蘇寧阿的介紹多側重在其軍事方面的事蹟，對於他的學養、人格特質等方面毫無著墨，然而在後世所纂修的地方志與檔案文獻裏，卻還能保留些許這方面的訊息。如《續天津縣志》說明了蘇寧阿的基本性格及為人，還透露出他對風水堪輿的瞭解。其云：

體恤屬員，仁愛士卒，向例鎮署宴客，營弁備酒筵，公從不留賓，而亦不赴人約。精於風鑑，以津邑多火災，乃鐘鼓樓與縣署旁之魁星閣所致，以其高出城內，二為火數故也。商之同城運道各官，於學宮後建樓，變火數為木數，火災於是乎熄。性廉潔，每典衣以繼饗。工詩善書。<sup>⑨</sup>

又如民國三十八年編寫的《新修張掖縣志·人物志》認為他擔任甘肅提督時，守禦川楚教匪，凡事親力親為，而且還能善用智謀、獻奇策，得到長官的認同：

蘇寧阿，滿洲人，自束發（髮）從戎，屢建邊功，從無挫衄，所至以愛民為先。嘉慶初任甘肅提督時，川楚教匪猖獗，總督駐漢中，相機進剿。河西為關中遮罩，蘇竭力守禦，以忠義固結人心，凡關墩之設、營陣之法、邸閣之儲糧、兵車火礮之置造，事事不假人手，無事如臨大敵，然復以其計畫獻議於督師曰：「蜀地險阻，用兵為難，公若檄調甘涼之兵，由漢中取道以搗賊巢，公以大兵取重慶交〔感〕<sup>⑩</sup>之，則賊不足平矣！」又云：「當出奇以過其鋒，審勢以伐其謀，若硬打死仗，是損將以自殘也！或徒尾其後，是驅賊以走險也！」督師深然其策。<sup>⑪</sup>

同時又描述了他對生態環境與人民生計的重視。文中記載他在嘉慶四年，曾親往黑河上游視察，對於祁連山水源涵養林的重要性早有認識，還以實際的手段與措施來禁止破壞，因此甚得民心，其云：

性尤淡泊，一衣一食動以民膏為念，故處處為地方策萬全。有商民請開八寶山

⑨ 清·吳惠元修，清·蔣玉虹、清·俞樾纂，《（同治）續天津縣志》（收入《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華北卷》第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據清同治九年刻本影印），卷一一，〈名宦〉，頁15a，總頁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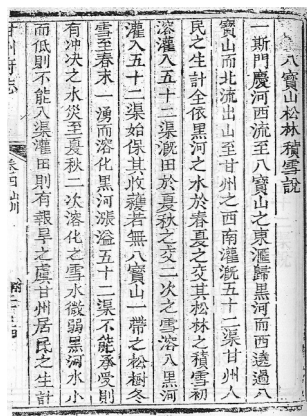
⑩ 此字不甚清晰，以其外廓、字義判斷。「感」同「戚」，古兵器名，斧的一種。

⑪ 白冊侯原纂，余炳元續纂，《（民國）新修張掖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甘肅府縣志輯》第45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民國三十八年修抄本影印），頁395。

鉛礦，大吏已允如所請，特以地屬甘提，徵求提督同意。蘇乃親往履勘。見八寶山松柏成林，一望無涯，皆數百年古木，積雪皚皚，寒氣襲人，欣然曰：「此甘民衣食之源，顧可徇一二奸商之意，犧牲數百年所培之松林耶！」（恐礦徒伐森林，以致水源不足。）迺反對開礦，專摺奏明，幸沐允從。用鐵萬斤，鑄「聖旨」二字，旁註「伐樹一株者斬！」是認八寶山森林為國所有，後之守土者隨時嚴禁，以保水源，則有功於張掖者甚大。<sup>12</sup>

當時蘇寧阿命人鑄立的鐵牌上鐫刻著：「偷伐松林，有礙水源；摧毀民生，既絕民命。特立此牌，以告鄉民，有伐樹者，與命案同。」<sup>13</sup>顯見他對保護水源涵養林的決心。

嘉慶七年，他又寫了〈八寶山來脈說〉、〈八寶山松林積雪說〉（圖三）、〈引黑河水灌溉甘州五十二渠說〉等三篇文章，<sup>14</sup>詳細闡述保護黑河水源的重要性及水資源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問題，認為「甘州少旱災者，因得黑河之水利故也。黑河之源不涸乏者，全仗八寶山一帶山上之樹多，能積雪溶化歸河也。」<sup>15</sup>以提督之職，卻如此關心黑河水利及水源涵養林，此舉對黎民生計的貢獻，可謂功在千秋；其識見之遠，亦可見一斑，堪稱是環保先鋒。而這起對當地百姓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到後來還發展成一段神話故事，至今仍在當地流傳。<sup>16</sup>



圖三：《甘州府志》收錄蘇寧阿所書〈八寶山松林積雪說〉（翻攝自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此外，蘇寧阿在清代外交史上也有其一定的貢獻。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馬嘎爾尼來華是清朝外交史上一件大事，關於這事件的始末，中外文獻記載頗為豐富，其中對於當時奉乾隆諭旨到天津海口迎接馬嘎爾尼使節團的清朝官員，除了直隸提督慶成、內務府官員徵瑞、天津道臺喬人傑、天津鎮通州協副將王文雄等人，其實天津鎮總兵蘇寧阿在此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天津鎮是清代直隸名鎮之一，天津鎮總兵統轄鎮、標二營，兼轄河間、大沽二協、務關等營。<sup>17</sup>蘇寧阿也是英使團在天津登岸時負責接待的人之一，<sup>18</sup>而且還將當時官員往來公文蒐集起來，編成《乾隆五十

<sup>12</sup> 白冊侯原纂，余炳元續纂，《（民國）新修張掖縣志》，頁395。

<sup>13</sup>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沙漠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179。

<sup>14</sup> 案：此三文收入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甘州府志》中，署於嘉慶七年，蓋成書之後補刻。

<sup>15</sup> 〈引黑河水灌溉甘州五十二渠說〉，載於清·鍾慶起纂修，《甘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據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影印），第2冊，卷四，〈地理·山川〉，頁附23：5，總頁433。

<sup>16</sup> 文木，〈祁連·黑河·居延海——楊發振和他的居延情結之八〉，《張掖日報·西部開發報》2004.09.27。

<sup>17</sup> 直隸省綠營營制為順治元年所定下。當時，直隸設巡撫，置撫標左、右二營，並設宣府、真定、薊州、通州、天津及山海關六鎮總兵官，並鎮標以下各協、營、汛。後經改制，設總督、提督及七鎮，所屬各協、營、汛亦經調整改設。

<sup>18</sup> 郭鴻林，〈馬嘎爾尼使團與天津——乾隆接見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天津日報·文史》2004.06.14，第14版。



八年英吉利入貢始末》<sup>19</sup>一書，成為後來考證英使馬嘎爾尼來華的一項重要文獻史料。

筆者又查得蘇寧阿頗衷於黃老道學，自號「癡道人」，著有《道德經解》、《煙霞錄》<sup>20</sup>等書。嘉慶六年（1801），蘇寧阿時任寧夏將軍仍兼甘肅提督，於蘭州城南郊五泉山聆聽雲遊當地的道醫劉一明（1734-1821）<sup>21</sup>開壇講經，二人因而結識，時有來往走動、互通書信，蘇寧阿並將自己的著作請劉校改字句。劉在自己的著作《棲雲筆記》裡多次提到蘇寧阿，<sup>22</sup>稱他為「蘇將軍」、「癡翁」、「癡翁先生」、「老先生」、「老大人」等，並為其著作撰寫序跋。對他這位同道契友之人格、處世態度及道德學問有極高評價，盛讚他的道學造詣「已悟真詮」，<sup>23</sup>認為蘇寧阿是「非塵世中人，系在塵而出塵，處世而離世者也。」<sup>24</sup>

另楊鍾義《雪橋詩話餘集》卷五云：「迂庵總鎮蘇寧阿，嘗立戰功於西域，以茶、鹿餉江秋史<sup>25</sup>。秋史有詩云：『分到芳廚慰藿藜，水經仙策費參稽。風生盧腋醒客狂，書仿顏筋餉病妻。曉藥江梅香細翦，春茸澗草綠初齊。書生小潤談兵口，犄角還從縛尉犁。』」<sup>26</sup>可知蘇寧阿文武雙全，其書法還得顏真卿神髓。

### 三、《回疆圖》繪圖時間、緣由

蘇寧阿在《恒一堂集》裡對繪製回疆地圖的緣由有一說明，與傳圖所藏《回疆圖》更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我們仔細探討。《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在其所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恒一堂集》提要裡有云：

別本《恒一堂集》不分卷，清鈔本，殘存三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無序，亦無總目。冊一封面題「文集三」，為《煙霞錄》，錄文三十三篇。〈遨遊記略序〉作於乾隆四十年，自敘生平云：「丙寅冬，先府君除授貴州府知府，時余

<sup>19</sup> 原件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嘎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亦收錄此日記。

<sup>20</sup> 清·劉一明著，孫永樂評注，《劉一明：棲雲筆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卷二，〈傳序類十二·癡翁道德經解跋〉，頁59。

<sup>21</sup> 劉一明為清代著名內丹家。號悟元子，別號素樸散人。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後半生一直隱居甘肅榆中縣棲雲山、興隆山修道。他精通內丹、《易》學，兼通醫理。

<sup>22</sup> 劉一明著，孫永樂評注，《劉一明：棲雲筆記》卷一，〈詩詞贊辯類六十七·奉癡翁先生〉，頁11。小注3：「《棲雲筆記》卷一有咏蘇詩作七律三首：《會心集》有咏蘇七絕八首、七律三首；卷二有為癡翁《道德經解》所撰序文及跋各一篇；卷三有書信五篇。」

<sup>23</sup> 劉一明著，孫永樂評注，《劉一明：棲雲筆記》卷一，〈詩詞贊辯類一百二十九·癡道人勤勞王事，兼能修養，因以將軍為寓，口占七言律二首奉呈〉，頁23。

<sup>24</sup> 劉一明著，孫永樂評注，《劉一明：棲雲筆記》卷二，〈傳序類十二·癡翁道德經解跋〉，頁59。

<sup>25</sup> 清·江秋史（1752-1793），名德量，號秋史，字成嘉，一字秋水，又號量殊，江蘇儀征人。收藏舊拓碑版及宋本書甚富。

<sup>26</sup> 楊鍾義，《雪橋詩話餘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04冊，臺北：新文豐，1989），卷五，頁69。

十六歲矣，隨守播州。自丙寅迄癸酉八年之中，余往返於燕黔之途六次。甲戌春，荷蒙聖恩，擢爲侍衛。自持戟至癸未十年間，東至興京、南至江浙、北遊紫塞，吳越齊魯、陪京沙漠，無年或息。而其中於庚辰歲復往返黔南，由長江而抵會通。甲申孟春，從軍回疆喀什噶爾，征勦烏什，歷秦晉韓魏，萬六千餘里。新疆山川形勝、中州枝幹龍脈，日繪一圖，以記其略，西域之地利，亦稍悉其梗概焉。」<sup>27</sup>

這段〈遨遊記略序〉清楚交代了蘇寧阿的從軍經歷，並約略描繪他繪製西域地圖之梗概，而且從中尚可推斷出他的確切生年。<sup>28</sup>其下又說：

冊二題「文集六」，乃乾隆四十七年至嘉慶元年所作祭文、遊記之類。末有莊士寬跋，……冊三題「文集七」，有乾隆五十四年所作〈正定鎮形圖說〉、〈天津形勝說〉、〈滄溟一覽記〉、〈致喬道臺書〉等。記事止於嘉慶元年。雖是武人之作，但隨扈、轉戰，自記行程，多可據以考究乾隆年間邊地概略。<sup>29</sup>

傅圖所藏《回疆圖》前後兩篇跋語也提供了考證作者蘇寧阿及其繪圖作說之時間、緣由的關鍵訊息，故錄文如下：

〈山川影〉跋：

乾隆丙寅歲（十一年，1746），寧隨守播州，登仕籍後，從戎西域及徇甸，奔馳四方，逮甲午歲（三十九年，1774），計將三十年，少悉寰海山川形勝，且因地理家未到西域，弗悉幹龍入中國之來由，不揣鄙陋，妄著〈山川影〉，書於〈回疆圖〉首，以補成全璧，俾業地理家觀寧所創關外圖，則審源知委，究本悉末，幸祈後世宿學君子留心體察，爲地理家之一助。倘於舛錯處再加訂政，更救其謬，則益於後學，又爲寧之良師、地理家之儀型道範也，是爲記。時大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歲次癸巳孟秋良日。書成於古中山六合客館，易水李梓摹圖於紫荊關之四松亭。五十四年（1789）歲次己酉六月六日，恒山梁璞書字於正鎮之正定書屋。

另卷末跋：

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二十四日，余於侍衛任內出卡倫，兵赴喀什噶爾，三月十七日出嘉峪關，自八道溝向西行，由沙州至哈密係新路。於三十二年九月初四日，自哈密向東行，由安西至八道溝歸路至嘉峪關係舊路，按山川道路險易形勢，日繪一圖，凡山之枝幹、河之源委、形勝扼要、水草田土，有關於

<sup>27</sup>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上冊，頁739。

<sup>28</su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對於蘇寧阿生年（雍正〔九〕年）持保留態度，然而《煙霞錄·遨遊記略序》云：「……丙寅冬，先府君除授貴州府知府，時余十六歲矣……。」丙寅爲乾隆十一年，是年蘇寧阿十六歲，依此推算，蘇寧阿生於雍正九年應當是可信的。

<sup>29</sup>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上冊，頁739。

屯戍防守者，莫不備載。且唐人言地理者，只云山脈發派崑崙、艮震巽三大幹入中國、黃河發源於星宿海大略而已，以其未曾至西陲遠域也，故不知星宿海以西尚有來源！余將所經歷之山川繪圖作說，名曰〈萬里回疆圖〉，以備後之好古博學者之採取考覽焉。圖成於癸巳歲紫荊關參將署中之四松亭，裝裱於己酉歲六月正定總兵署中之正定書屋。兩分兩卷，遂付與長子額勒謹、次子額樂春、三子額樂布、四子額樂昇、長孫福謙、次孫益謙、三孫吉謙，世藏以爲傳家之珍，敬之重之！豐寧蘇寧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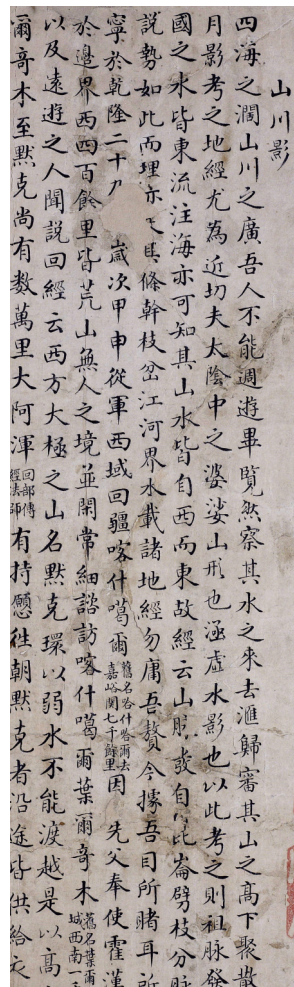
可知此圖原稿是蘇寧阿在乾隆二十九年侍衛任內出兵喀什噶爾三年多的時間裏，隨時隨地訪察詢問記錄下來，而後於乾隆三十八年紫荊關參將任內，由李梓根據他所畫的草圖重新摹繪而成。蘇寧阿另撰〈山川影〉（圖四）、〈西域回疆記略〉、〈沙州記略〉等文，乾隆五十四年由梁璞重新謄抄附於〈萬里回疆圖〉前後，再加以裝裱兩分兩卷，用以作爲傳家之寶，本館所藏爲其中之一。

## 四、《回疆圖》的內容

《回疆圖》全卷可分成三大部份：

第一部份爲文字，又分成三個段落，首段是〈山川影〉，實際上就是一篇中國地理總論。自古中國風水學皆認爲，中華大地上三大龍脈都發源於崑崙山，形成了中國地勢西北高、東南低的地形。蘇寧阿在〈山川影〉開篇即云：「夫太陰中之婆婆山形也、涵虛水影也，以此考之，則祖脉發自坤方、向乎艮地，中國之水皆東流注海，亦可知其山水皆自西而東，故經云山脉發自崑崙，劈枝分脉有三大幹入中國之說。」蘇寧阿以他對風水堪輿的認識，闡述當時中國境內主要山川的分佈、走向及地理特徵，其旨在強調西域回疆即爲中國三大龍脈源頭，並道出他繪圖作說之原委。其二是敘述發源於長白山天池的河流。末段則是抄錄乾隆四十七年（1782）命四庫館臣編輯《河源紀略》的上論，總計字數共約九千餘字。

第二部份爲主圖〈萬里回疆圖〉（圖五），總長約 532 公分。具體方位爲上北下南。所描繪的區域，東起甘肅肅州，往西經嘉峪關，及至蔥嶺（喀什噶爾以西），南至崑崙山接西藏界，北至天山接伊犁界，延袤萬餘里。繪出分佈其間的山巒、河泉、植被、驛站、營壘、關隘、屯戍、屋舍等，並標示境內行軍所經路線及里程。



圖四：〈山川影〉局部





圖五：〈萬里回疆圖〉局部（一）





圖六：〈萬里回疆圖〉局部（二）圖面註記



本圖採中國傳統「計里畫方」和圖畫式的「形象繪法」繪製，平面與立體圖形交互運用，呈現出左右長而上下相對窄扁的卷軸式繪畫。首先於空白畫心在縱橫方向每隔6公分以墨線標出經緯方格線，並勾勒自然地物（山脈、河川、水泉、植被等）與人文地物（關隘、城垣、驛站、墩臺等）圖象輪廓。山巒方向並不一致，上頭標記的文字方向亦不同，其視角顯係以交通路線為中心望向兩側。近處山脈繪以淺絳色、遠山則敷以石青。不同地物以形象符號表示，河川、水泉繪以雙曲線，內填石綠色。植被畫法亦有區分，柳樹以簡筆繪其枝葉，形象鮮明可見，其餘樹木則以石綠敷染於赭色主幹，代表樹葉。瞭墩為底闊頂窄的梯形長方體，上豎紅色三角旗幟。關隘、城垣多以二或四面開門之回字形方框表示，重點大城如肅州城、嘉峪關、喀什噶爾新舊等城，所繪城周面積更大，並可見立體之城樓、城門，可能是依據當時實際的城垣形制。公館、店鋪、窩鋪以懸山頂房屋形式代表，少則單開間，多則四開間，可見一側山牆。游牧部族牧地以若干豎直而平行的線條圍成方形。紅色虛線代表作者行軍往返的道路，在兩交通節點間則標示里程。

圖面上的註記是為一大特色，許多地點以文字詳述其地形地貌、氣候條件、民生經濟、注意事項等。（圖六）如：惠回堡右側有泉水：「泉自南向北流抱城」；紅柳硤處註記：「紅柳硤水有毒，新設無水，自高泉運水」；哈密處遠山註記：「自哈密起山勢漸高，自物拉泉上支巽行通咬牙溝，脉自物拉泉西北行五里即有泉，上至沙藻泉即脉脊，往西下行至梯子泉又高，又係一支北幹之山，蒼茫雄固。……瞭墩之西見其起，綿亙五六百里，勢成半圓，中現兩落凹處，暖似孟夏，高處涼似深秋，風起則寒，風息則熱，晝騰蒸鬱若溽暑，夜生嵐瘴如起寒，宜避暑防寒，且泉水與雪水性極冷，胃易受病，人難調攝者此也。」闢展東南一瞭墩註記：「泉清湧內多蛤蟆，夜出晝入」；兔尔番南方註記：「自兔尔番至西山三十餘里，泉高土肥，大河開壅，足備灌溉。」過四塘溝後有一「烏什他拉屯田守備住處」，其下註記：「地墾二十餘頃，兵九十人。」烏什他拉屯田守備住處南方大山有一段文字註記：「此林深邃，北連大山，南接大湖，為群獸出沒之所。七月間麥熟，大野猪率群猪三五十而來，踐踏盜食，人莫能禁，且不惧鎗砲之聲。烏什他拉之山乃博爾土塔板之南麓，自乾向巽平拖一脉，故墾為田。雨少雪多，雪水自此溝出，遂開渠引以溉田，不籍（藉）雨水而田禾自熟，成回部膏田。云大湖兩岸有人居焉，漁魚為生計，衣魚皮而食魚肉，不事耕織。」庫車城註記云：「城藉支龍建立，牆只一半，餘皆支土，壘垣聚水，為東面之屏藩，西北南三面可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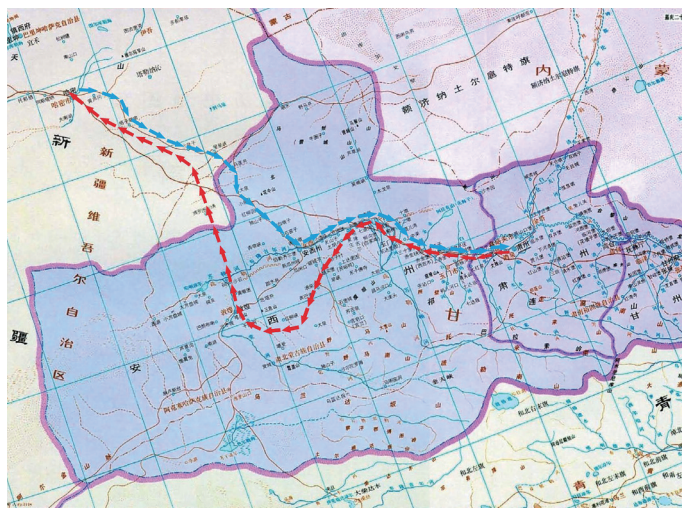
其他諸如道路走向、住民多寡、當地植被、物產等也皆有文字註記，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自然地理、民生經濟史料。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云：「按舊一統志載，自安西鎮抵哈密分二道。一由安西鎮為東道；一由沙州為西道。後因安西鎮為往來總匯，始專行東道，即今由得勝墩，經格子烟墩，至哈密之路。乾隆二十七年移設安西府於敦煌，專行沙州之西道。三十二



年仍改由東道云」。<sup>30</sup>西路從沙州敦煌可經青墩峽、博羅特口前往哈密；東路則一直是往來哈密與嘉峪關間的主要道路。蘇寧阿行軍往返甘肅、新疆的時間正值東西改道之際，故而乾隆二十九年出發時走西道（新道），三十二年返程走東道（舊道）。在此羅列他在主圖上所標記其西行路線如下：

去程（經新道）：肅州→嘉峪關→雙井子→惠回堡→赤金湖→赤金峽→玉門縣→三道溝→八道溝（新舊道岔路牌樓轉往西南方向）→十道溝→禿葫蘆溝→馬圈子尖站→踏實→大泉子→塔兒泉→山溝百曲公館→樹溝→新店子→紅柳邊橋→沙州城→林家窩舖→土窩子→紅沙山→青銅峽→婆羅轉徑→婆羅台→城泉→大泉→雙泉→石山→苦水→窩舖→紅柳峽→窩舖→高泉→雙泉→柳泉→牌樓→哈密新城→哈密舊城→刺梅花→頭堡→二堡→物拉泉→三堡→柳樹泉→沙藻泉→梯子泉→瞭墩→梧桐窩→三間房→十三間房→七間房→店→七個台→蘇魯圖→關展城→納木心→慎金→納木沁台→古玉門關出山口→兔爾番→牙莫箐→牙莫齊→不干湖→小泉→托克遜城→蘇巴什湖→二塘溝→庫米市麻哈→四塘溝→烏什他拉屯田守備住處→曲回站→清水河→哈爾沙爾→紫泥泉→山口→巴沙阿拉→哈爾沙阿滿→出山口→庫爾札台→庫爾勒站→哈爾布拉克→車爾楚→野人溝→策大雅爾→羊雜爾→阿勒博克圖→阿拉巴特→它哈奈→庫車→河色爾→賽里木→拜城→雅爾幹→雅爾哈里克→滴水泉→哈爾玉拉滾→札木→園子→阿克素→園子→河會→窩舖→阿什塔奇台→洋海→烏什城→鄂拖巴什→亮噶爾→色布拉扒→哈色個布拉個→關展→粘布拉斯→齋都把→素渾→過峽→泉→巴爾昌小卡子→梧桐窩→六十里庄子→阿爾虎卡倫→阿爾土使庄子→諾海搭板→山溝→博什克木庄子→博什克爾木→和卓墳→喀什噶爾舊城→喀什噶爾新城（圖七、圖八）<sup>31</sup>



圖七：蘇寧阿行軍路線：肅州至哈密（紅色箭頭表示去程所經新道，藍色箭頭表回程所經舊道）

<sup>30</sup>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清同光間〔1862-1908〕活字排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九，〈疆域二〉，頁1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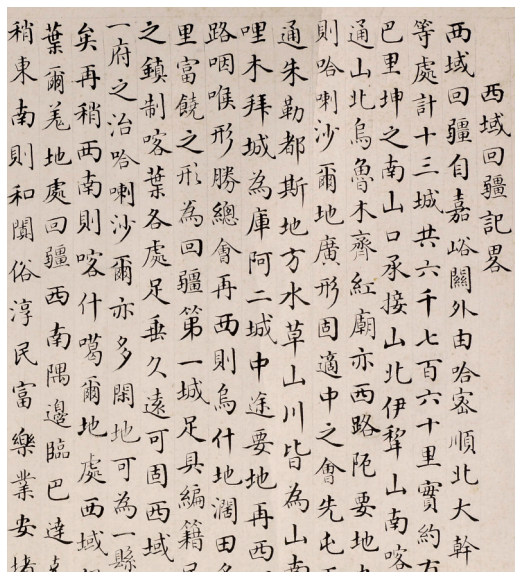
<sup>31</sup> 該行程路線圖以中國地圖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清時期》之〈甘肅〉、〈新疆〉為底圖，將蘇寧阿西行的重要地點進行標記繪製而成。



圖八：蘇寧阿行軍路線：哈密至喀什噶爾（紅色箭頭表示去、回程所經路線）

回程（經舊道）：喀什噶爾（喀什噶爾往東至哈密新城路線同去程）→牌樓→黃龍崗→四十里井子→長流水→滴水崖→鴿子烟墩→紅山子、天生墩→酤水→噶噠泉→小紅柳園→小泉→大泉→地窩舖→馬連井子→紅土崖→咬牙溝→星星峽→安西→八道溝（八道溝以東路線同去程）→肅州（圖七、圖八）<sup>32</sup>

第三部份為〈西域回疆記略〉（圖九）、〈沙州記略〉等十三篇邊地山川形勝記略，末尾則是蘇寧阿的題跋（後序），共計六千餘字。〈西域回疆記略〉為西域回疆的總說明，敘述境內各城居處形勢重要性及與其他邊城的依存關係，蘇寧阿並從軍事的角度陳述個人對治理回疆的見解，以求安邊禦外，建議在回疆「開沙土之路」、「編籍戶口，以助兵力」、「多屯多戍，改土歸流」等。其後則分別說明沙州、安西、哈密、關展、哈喇沙爾、庫車、賽哩木、拜城、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等十三個城市<sup>33</sup>的地理形勢、風土民情、用兵之



圖九：〈西域回疆記略〉局部

<sup>32</sup> 此段路線內所經地點如星星峽、馬連井子、大泉，蘇寧阿標記的地理位置與其後同路線西域行記之著作如林則徐《荷戈紀程》、謝彬《新疆遊記》等所記前後順序正好相反，有待進一步考證。

<sup>33</sup>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在其所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恒一堂集》提要裡有云：「其記邊地山川形勝之文有：〈萬里回疆文後序〉、〈太安驛記略〉、〈山西記略〉、〈潼關記略〉、〈西安記略〉、〈平涼記略〉、〈甘肅記略〉、〈肅州記略〉、〈西域回疆記略〉、〈沙州記略〉、〈安西記略〉、〈哈密記略〉、〈哈喇沙爾記略〉、〈庫車記略〉、〈賽哩木拜城記略〉、〈阿克蘇記略〉、〈烏什記略〉、〈喀什噶爾記略〉、〈葉爾羌記略〉、〈和闐記略〉、



道及治理之術。從蘇寧阿十三篇記略裡隨處可見其經世致用的具體表現，如〈阿克蘇記略〉：「阿克蘇，北通伊犁一千四百里，雖險阻冰山，亦南北必由之途，乃回民貿易之徑。東控庫車六百九十里，西扼烏什二百四十里，為葉爾羌、喀什噶爾之咽喉總會，地衝形要，田沃人衆，雖建堡駐兵，惟惜其輕不足以制重，寡不足以禦多，蓋循舊章而忘形勝之要害，視一時而忽日後之控制也，必須更立章程，擴大制度，肘腋烏什，表裏鞏固，遙接喀葉和三城，關鎖伊阿烏南北，若此則貫串一勢，結聯成局，可息外徼之窺，竊足振極邊之聲勢。」又如〈喀什噶爾記略〉裡提到：「喀什噶爾，地處回疆極邊，西鎖霍罕，……而處極邊接壤外地，關係綦重，有事則先受其兵，為西域最要之地。其難治安者，喀城回衆。……所恃者，南隣葉爾羌，彼此相依，英阿雜爾處中以消息之。東至烏什，則又遠在八百之外，而中又無承接之地，所謂鞭長莫及，難成鼎足之形，欲求為久遠長安之計，須於喀、烏兩城之適中、關展等處墾地屯戍、築城游牧，遙接兩城之勢。」這些都是他勘查回疆地域形勝，並尋求治理之道，把輿地之學與解決現實問題相結合的見解。

## 五、《回疆圖》的價值

根據〈古地圖定級規則〉：<sup>34</sup>

古地圖價值通常體現在文物、學術、技術和藝術四個方面。文物價值側重以古地圖製作的時代及存世狀況為衡量尺度；學術價值側重以古地圖承載內容的學術地位及資料價值為衡量尺度；技術價值側重以古地圖製圖技術的科學性為衡量尺度；藝術價值側重以古地圖具有的繪製特色和藝術水準為衡量尺度。

在時序上，《回疆圖》已屬於古地圖定級裡的最高層級——一級古地圖，它的重要性顯現在其學術資料性、歷史文物性、藝術代表性三方面，以下分別說明：

### （一）學術資料性

有清一代，西北邊疆史地學術得到長足的發展與進步，從清初入關一直到清末，邊疆史地研究成為一方顯學，「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間競言訓詁音韻焉。」<sup>35</sup>

〈老鷹崖毛口江記略〉、〈雲南省記略〉、〈新街記略〉、〈緬甸老官屯記略〉等，皆作戰時所經之地。」（頁739）上引文裡面有關回疆的著述，除去〈遨遊記略序〉、〈萬里回疆文後序〉（案：疑即《回疆圖》卷末蘇寧阿寫的序文）外，較之《回疆圖》第三部份〈西域回疆記略〉等文，僅僅少了〈關展記略〉。

<sup>34</sup> 修訂中，來源：中國古籍保護網

[http://www.nlc.cn/pcab/gjpc/gjpc\\_zcwj/201411/W020141121491983148080.pdf](http://www.nlc.cn/pcab/gjpc/gjpc_zcwj/201411/W020141121491983148080.pdf)（PDF檔，2022.09.07檢索）。

<sup>35</sup> 梁啟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史學·方志學·地理學·譜牒學〉，載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中華書局，1969），頁322-323。



根據學者研究，清代這一股西北邊疆史地研究風氣進程可分為四期：入關至乾隆末年為興起期；嘉慶年間為發展期；道咸年間為繁榮興盛期；同光宣年間為終結期。<sup>36</sup>

第一個時期，關於邊疆史地的私家著述不多，內容也相當簡陋。史料記載，可以發現從康熙二十九年（1690）征討準噶爾開始，部份從軍軍人、官員及謫戍邊疆的文人學者便開始以遊記、筆記、詩歌的形式來記載其在邊疆的所見所聞、地理形勝及風土人情。康熙時期如梁份（1641-1729）《西陲今略》、殷化行（1643-1710）《西征紀略》、馬思哈（?-1704）《塞北紀程》、范昭遠《從西紀略》。雍正時期如方觀承（1696-1768）《從軍雜記》、夏之璜（1698?-1784）《出塞日記》。乾隆時期如紀昀（1724-1805）《烏魯木齊雜詩》、《烏魯木齊雜記》、七十一《西域聞見錄》等。除此之外，邊疆大吏也參與了著述行列，如永貴（1706-1783）等的《新疆回部志》。更重要的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新疆後，清政府派人入回疆實地考察測繪的著作，體例嚴謹、考劾詳實、內容豐富，學術價值頗高，如傅恒等奉旨纂修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等即是。

從嘉慶開始，西北邊疆史地著作逐漸系統化，並有較高的學術性，像祁韻士（1751-1815）《西陲總統事略》、《西陲要略》、和寧（1741-1821）《回疆通志》、《三州輯略》、徐松（1781-1848）《新疆識略》、洪亮吉（1746-1809）《伊犁日記》、《天山客話》等等，直至清末仍不斷有相關著作問世，可以想見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術的盛況。

學者把這些西行之人前往西域的過程或到西域境內隨手所記之書，稱為「西域行記」。<sup>37</sup>有清一代，這類型著作數量頗多，蘇寧阿此件《回疆圖》並不算特殊，屬於前述第一個時期的作品，只比永貴等的《新疆回部志》晚一年完成，卻較七十一《西域聞見錄》要早四年，算是清代新疆方志中成書甚早的作品。

相較於前述二書及官修史志與後期的著作，《回疆圖》內容似嫌簡略，繪圖亦較粗略。但輿地之學重在當下實地考察，此圖篇幅雖然不長，然而圖中記載的各地風土民情、生態環境、植被生長、水源狀況等都是蘇寧阿行武所經，親身歷見，真實可靠，與其他行記著作一樣，均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其西行路線、里程計算更是古代道路交通研究、歷史地理學重要的一環。更何況此類西域行記並非一時之作，隨著時代更迭，許多人事地物也不斷改變，須知回疆入清朝版圖是在國勢鼎盛的乾隆年間，到了守成的嘉慶時期，國勢開始轉弱，回亂頻傳。道咸以降，更由於受西方帝國主義侵擾，新疆、西藏、雲南等邊區政經情勢產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與危機。為了鞏固國防，朝廷也不得不回疆治理上有所舉措，如築城牆、修驛道、增加駐軍、移民等，其實也正應了蘇寧阿十三篇記略裏所倡議治理回疆的意見。這卷《回疆圖》猶然為以後的新疆研究保留了許多乾隆中期的歷史資料，就如同《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裡所言：「雖是武人之作，但

<sup>36</sup> 侯德仁，《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頁43。

<sup>37</sup> 謝娟燕，《清代西域行記研究》（廈門：集美大學碩士論文，2021），頁1。

隨扈、轉戰，自記行程，多可據以考究乾隆年間邊地概略。」<sup>38</sup>可與其他時期作品相互考究、比較回疆局勢的變遷。因此，《回疆圖》的確是研究乾隆時期西域回疆的重要參考資料。

《回疆圖》亦可補史書人物傳記記載之不足或訂正史書修纂之訛誤，譬如蘇寧阿的生父即可透過此圖所提供的線索再參酌相關文獻考查出來。根據《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對於中國科學院藏本《恒一堂集》冊一《煙霞錄·遨遊記略序》的敘述，乾隆十一年冬天，蘇寧阿的父親受命出任「貴州府知府」，他則隨著父親鎮守「播州」。當時貴州共分思南、銅仁、石阡、思州、平越、鎮遠、黎平、都勻、遵義、貴陽、大定、安順、興義等十三個府及平越州、普安廳，其中遵義府治，古稱「播州」，由此可知蘇寧阿的父親應是前往遵義赴任。清道光年間所修的《遵義府志》裡頭記載，乾隆十二年任遵義知府者為「四十七，正白旗蒙古人。」<sup>39</sup>後於乾隆十九至二十四年任大定府知府，<sup>40</sup>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任貴東道（提督學道）。<sup>41</sup>因此四十七應是蘇寧阿的父親。

傳圖收藏的這卷《回疆圖》正好提供一個有力的證據，因為蘇寧阿在〈山川影〉中有言乾隆二十九年出兵喀什噶爾時，「先父奉使霍漢，旋喀，寧迎於邊界……。」「霍漢」即「霍罕」或「浩罕」，為一中亞古國。《清實錄》裡記載，此年奉派出使霍罕者為員外郎四十七、藍翎侍衛官長保等人，<sup>42</sup>當時乾隆皇帝還說他（四十七）「久歷外任」，正與其在貴州十多年間所任各項職務相符。綜上所述，四十七確為蘇寧阿的父親。

此外，有關蘇寧阿子嗣的描述，正史記載與蘇寧阿說法出現歧異，因為在《回疆圖》卷末跋曾提及此圖「裝裱……兩分兩卷，遂付與長子額勒謹、次子額樂春、三子額樂布、四子額樂昇、長孫福謙、次孫益謙、三孫吉謙……」，與《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國史列傳》所言：「子額騰伊，現任戶部員外郎。」<sup>43</sup>顯然不符。經查額騰伊在嘉慶二十至二十五年任戶部員外郎，<sup>44</sup>當時蘇寧阿早已謝世，然而在乾隆五十四年《回疆圖》裝裱時，他就已經子孫滿堂了，為何國史傳文中俱不列載，卻給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名字？又額騰伊的生年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sup>45</sup>那麼當《回疆圖》裝裱時，他應已十六歲左右，蘇寧阿漏記可能性不高，然而卷末跋語裏卻隻字未提，這顯然有違常理。

<sup>38</sup>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上冊，頁739。

<sup>39</sup> 清·平翰等修，清·鄭珍、莫友芝纂，《（道光）遵義府志》（道光二十一年刊本），卷二八，〈職官二〉，頁2。

<sup>40</sup> 清·黃宅中修，清·鄒漢勳纂，《（道光）大定府志》（道光二十九年刊本），卷三一，頁2。

<sup>41</sup> 清·周作楫修，清·蕭瑄等纂，《（道光）貴陽府志》（咸豐二年朱德璉經堂刻本），卷九，〈表六·職官〉，頁16-17。

<sup>42</sup>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七一九，頁18；潘志平，〈四十七使浩罕·霍罕路程·浩罕界〉，載於余太山主編，《歐亞學刊》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63-181。

<sup>43</sup>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〇〇，〈將帥四十〉，頁35。又東方學會編，《國史列傳》卷一八，頁4。

<sup>44</sup> 為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查詢所得。網址：  
<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0.6000391520569979>（2022.09.15 檢索）。

<sup>45</sup> 同上。

再者，額騰伊生有二子，長子名德謙，次子名垣謙，<sup>46</sup>雖名字尾字相同，或許不無親屬關係，但與蘇寧阿提到的三個孫子並不相符。筆者猜測或許額騰伊是蘇寧阿的子侄輩，而正史所依據的傳文資料所記有誤，抑或許蘇寧阿這些兒子中有人改了名。遺憾的是，關於蘇寧阿這幾位兒孫的生平事蹟，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有限，這些疑點仍有賴更多史料、檔案文獻進行更詳實的考覈。

總之，蘇寧阿這卷《回疆圖》不僅是研究乾隆時期西域回疆的參考資料，也提供了重要事證。既可補史書記載之不足，更證明史料取材恐有脫誤之虞，對後人研究、考證這位清代將領有其實際的助益，其學術重要性不言可喻。

## （二）歷史文物性

此卷《回疆圖》完成於乾隆三十八年，裝裱於五十四年，距今已二百多年，早已具備其歷史文物的意義。更可貴的，它是作者親身實地摹繪記錄的一件歷史文獻載體，能夠反映出二百多年前在回疆地區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及山川地理、地名等的變遷與消長。筆者查閱相關書籍，此圖似乎並不見諸著錄，<sup>47</sup>顯然尚未被學者所見與利用。若如蘇寧阿所言，僅裝裱兩卷做為傳家之寶，也就是說除了傳圖收藏的這一幅外，只有另一複本傳世，然而它如今安在？所以這卷文圖並茂的《回疆圖》極可能就是世間僅存的孤本，那麼，它的確是件可珍可寶的文物了。

## （三）藝術代表性

即是藝術價值。中國的輿圖繪製歷史悠久，但相較於刊刻印刷之地圖，手繪地圖繪製技術難度高，既費時又無法大量生產，因此流通不易。根據學者研究，明代以前繪製的輿圖能流傳到今天已經相當罕見，如今世界各地所見到的中國傳統地圖，絕大多數都是清代所編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色彩繽紛的手繪地圖，我們稱之為彩繪地圖。這批存世的彩繪地圖總量雖不是很多，但記錄詳實，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其繪畫技巧乃承襲中國的地圖繪製傳統和特點，與中國古代地理知識及空間概念有密切的關係。其類型豐富，風格多變，有的繪製精美，有的圖文並茂，極具審美價值與藝術代表性。傳圖典藏的古舊輿圖，雖然多數繪製時間不早於清代中葉，但卻有一些罕見的珍品，其中大幅彩繪輿圖如《青海圖》、《寧夏河渠圖》等，世間難得一見，《回疆圖》更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sup>46</sup> 同上。

<sup>47</sup> 如鄧衍林，《中國邊疆圖籍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吳豐培輯，《絲綢之路資料匯鈔·清代部分》（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6）；鄭炳林等編，《中國西行文獻叢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7）。



## 六、《回疆圖》的修復

民國九十二年初，筆者得知《回疆圖》保存狀況欠佳，隨即調件詳加檢查，發現卷端損傷相當嚴重，有必要立即修復，更需進一步改善此圖的保存方式。因此之故，同年本館裱褙室同仁在林茂生老師的指導下，按照選定的修復方案，逐步完成此件地圖的修復，並新製一錦盒以爲保護，於民國九十三年春大功告成。下文即是根據當時的修復紀錄修改而成。

### （一）《回疆圖》的受損情形及其原因

#### 1. 修裱前的檢查與記錄

檢查並作紀錄是文物典藏、修復的必要步驟，用以瞭解文物入藏時或修復時的狀況，並作爲選擇適當處理或修復措施的依據。在此我們對《回疆圖》做通卷的檢查，並記錄其基本資料如作者、年代、高廣等。對於畫心材質、用料、紙張強度、受損狀況等等，也都一一辨明與記錄。對畫面上有受損的部位，以數位相機拍攝存檔，以爲修裱時的參考及修裱前後參照用。

#### 2. 受損情形

筆者在進行《回疆圖》檢查時，發現此件手卷僅存畫心與上下鑲邊，缺少天頭、引首、隔水、拖尾等部件，亦無木軸桿。〈山川影〉的前端和上下鑲邊紙質有脆化情形。畫心起首處有一大塊缺損（圖一〇），並傷及蘇寧阿的鈐印，「蘇寧阿印」、「壽泉」兩印右半邊皆已缺損（圖一一）。另有好幾道經修補過的撕裂、脆裂傷痕，修補處有汙跡，另有一些則是未經修補的縱向、橫向斷裂痕（圖一二），還有幾片掉落的畫心，同時畫心有脫糊重皮現象及多道折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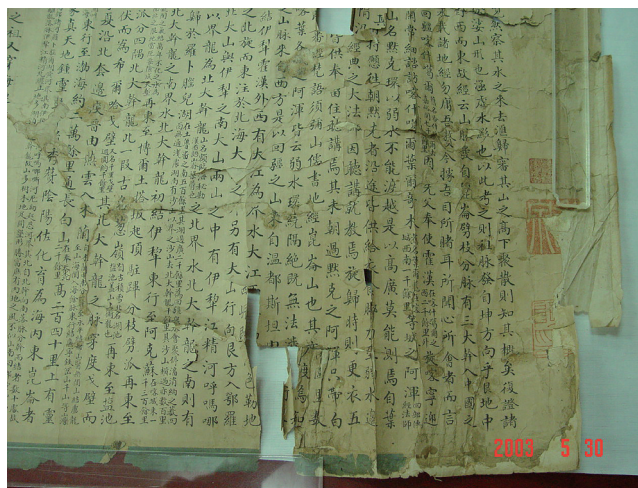
#### 3. 受損原因

此幅手卷受損原因可歸納如下：

（1）自然老化：此圖紙質經過二百多年的自然老化，已發酸變脆，機械強度下降，且紙色變深。

（2）前人不當修補：〈山川影〉前端有多處前人修補所留下的汙漬，在視覺上不甚美觀，筆者猜測應是修補時採用過濃的漿糊所造成。另外，在修補裂痕時並沒有將字跡對準，造成多處筆畫參差錯位。而且所用補紙過厚，補紙邊緣也未經過打薄處理，甚至還出現重疊現象，黏貼極爲隨興。這種貼膏藥式的修補法造成背紙厚度不一，更使畫幅發硬，難以收捲，在紙張已老化的情況下，使得畫幅在收卷舒展時再度受損，補紙兩旁出現更多折痕，甚至斷裂，劣化更形嚴重，修復難度亦相對提高許多。（圖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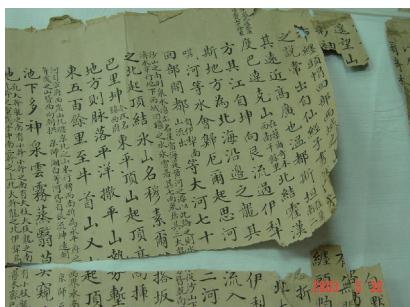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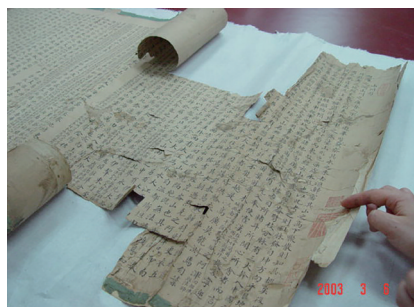
# 古今論衡



圖一〇：〈山川影〉破損情形



圖一一：「蘇寧阿印」、「壽泉」兩印缺損情形



圖一二：〈山川影〉縱橫向撕裂及縱向折痕



圖一三：〈山川影〉背面補紙與破損情形

## （二）《回疆圖》的修復措施

### 1. 修復原則

根據畫卷檢查結果，決定將修復的重點擺在〈山川影〉前端這部份的揭裱、修補缺損，使畫卷能恢復其完整性。對於畫卷其他部份，紙質老化程度較輕，畫心亦未受損，無需重裱，僅針對上下鑲邊做局部修補。並且加上新的引首、拖尾及軸桿，並量身訂製錦盒。

### 2. 修復過程

#### （1）清洗畫心

先將卷端受損部份從畫心接縫處揭離，獨立進行清洗，去除畫上的汙塵，也為下一階段的揭舊補紙步驟做事前悶潤的預處理。需注意的是，清洗畫心前需測試墨色是否會遇水暈開。本階段先以木條在裱桌上圍出一臨時洗畫槽，面積比欲清洗之畫心要大一些，再鋪以能蓋過木條的塑膠布，並用夾子夾在木條上。其後再放一張比畫心略大的不織布，將畫心正面朝下置於不織布上，從洗畫槽邊緣注入純水，約略蓋過畫心，靜待其完全潤濕。一旦水色變黃、變髒，即表示畫心汙塵被洗出，此時便更換新水，並重複操作此步驟至水色不變為止，再將洗畫槽污水漏盡。

#### （2）揭舊補紙

甫經清洗的畫幅仍相當潮濕，先連同不織布移置裱桌上，以乾淨的吸水紙吸去過多的水分。待畫幅約七、八成乾時，撤去不織布，再將畫心正面朝下夾以乾淨的棉紙，用水刷將畫心輕輕刷平，趁畫心仍微濕時將舊補紙拆除。

#### （3）綴合碎片

舊補紙拆除後，再使畫心正面朝上，將裂縫處字口錯位的部份進行調整對正，並將脫落之碎片回補畫心相應位置。

#### （4）固定畫心

為保護畫心及避免已綴合之碎片在揭覆背時挪動移位，事先以塗佈甲基纖維素（Methyl Cellulose，簡稱 MC）<sup>48</sup> 溶液的棉紙托裱於畫心正面，用以固定畫面。（圖一四）

<sup>48</sup> 甲基纖維素是一種白色或類白色、無毒、無味、無臭的粉狀高分子聚合物，在工業、食品、建築、造紙、印刷、皮革、醫療、化學、紡織、農業等方面均有應用。不易生霉、蟲咬，柔軟，乾後不脆。其溶液在乾後有較高的黏合力，略微加濕，其分子間會因遇水膨脹使黏合力下降，因此在紙質文物修復方面，通常是用以臨時固定破損嚴重的紙質或絲質書畫心、檔案、地圖等，利用塗佈其溶液的紙張托裱於畫心正面，可防止畫心在修復過程錯位或經絲緯線走位，待畫心小托後再將其揭去即可。





圖一四：畫心正面托裱已塗佈甲基纖維素溶液的棉紙



圖一五：揭背

### （5）揭除覆背

甫托裱固定的畫心仍不能進行揭背，必須待其全面乾燥後，再酌量以水潤濕，進行揭背的工作。

先在畫心邊角用鑷子、針錐嘗試揭紙，摸清背紙層次，再一層層拆除。揭背須揭乾淨，避免層次不一、厚薄不均，紙渣也要剔除乾淨。此外並將原先修補處過濃的黏膠刮除（可惜修復後，畫心膠漬污痕雖有變淺，但仍未能完全清除）。（圖一五）

### （6）補齊缺損

此後將已揭背的畫心稍事整平，對畫面有破洞、缺損處進行補紙。選擇與畫心紙質相近的宣紙，以茶葉水染色後進行補綴，使之與畫心底色相似。補紙與破口相接1.5公釐左右，畫背與補紙重疊處皆以刀刮薄，使能與原畫心厚度齊平。

### （7）小托命紙

修補後的畫心可進行小托。採用纖維較長、纖維縱橫方向均勻分佈、耐折度高的楮皮紙為第一次托裱的材料。由於畫心有輕微脆化現象，乃選用稍濃的漿糊水為黏著劑，將楮皮紙托裱於畫背，並趁畫幅未乾時，將固定於畫心正面塗有甲基纖維素的棉紙揭去，再將畫幅上牆晾乾。

### （8）鑲邊

由於此圖鑲邊材料皆已脆化，因此必須進行替換。將托裱晾乾的畫心下牆裁方，備妥與原畫鑲邊近似色之紙條進行鑲邊，並加鑲引首。對於全卷其他部份上下鑲邊有脫落及焦脆的部位，我們也以相近顏色之紙條修補替換，並補上一截拖尾，以便裝桿。

### （9）大托

鑲好邊的畫心即可進行覆背，為使與原畫厚度相當，顏色、紙質相近，乃以經過染色的宣紙覆背，並黏上絹製包首，上牆晾乾。

### （10）接合

約一個月後將晾乾的畫心下牆，上蠟研磨後裁去廢邊，再用濃糊與原畫卷黏合，復原全卷。接縫以長尺壓實，並以 C 型夾夾緊待乾，即可保持接縫處乾後平整不皺。

### （11）裁齊鑲邊

重新鑲邊時預留有裁切料，在畫幅收捲後上下鑲邊會有落差，必須經過修裁方能使圖卷高度如一。

### （12）安裝軸桿

鑲邊修裁後即依一般裝裱手卷的方式安裝軸桿、釘銅圈及綁畫繩，並貼上題籤。

### （13）訂製錦盒

加強保護措施，即為它量身訂製錦盒。丈量此圖收捲時的高廣尺寸，依此備齊製作錦盒所需材料，包括夾板、錦布、軟緞、海棉、黏著劑、鐵釘、骨插等，並依工序製作錦盒。至此《回疆圖》的修護即告完成。

### （14）修復完成（圖一六、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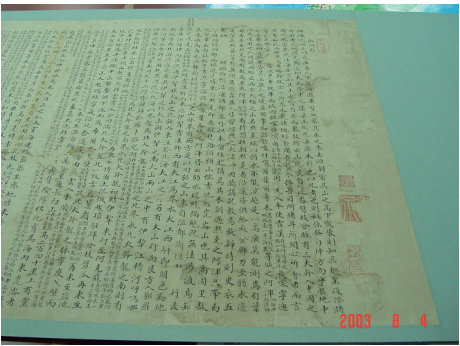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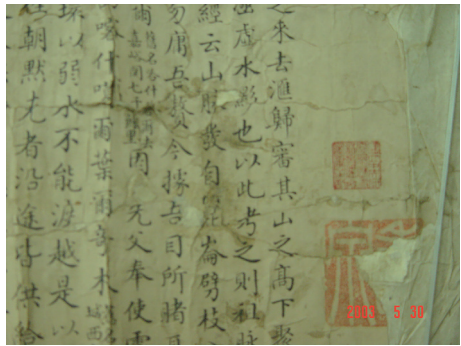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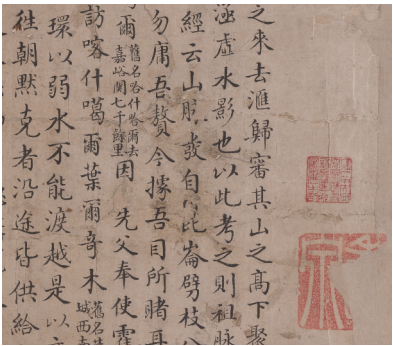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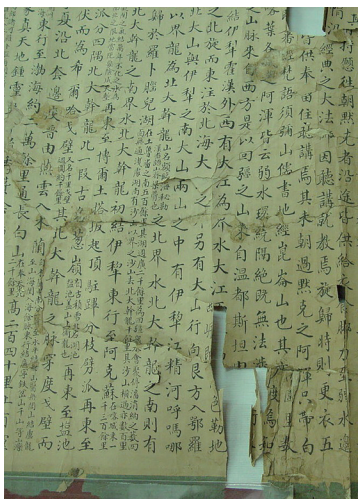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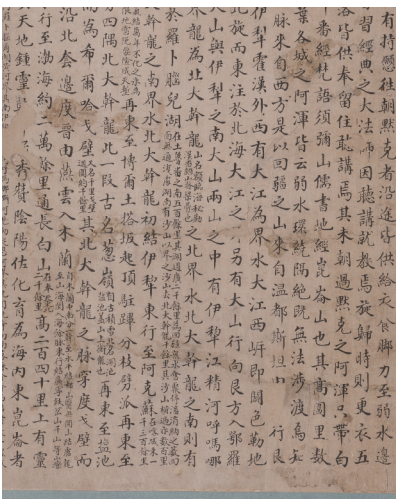
圖一六：《回疆圖》修復完成



圖一七：新製錦盒



表一：《回疆圖》修復前後對照

修復前	修復後
	
	
	
	



## 結語

一如前文所述，傅圖所藏《萬里回疆圖》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文物、藝術價值。一則內容可提供的訊息量，不僅是二百多年前作者對西域回疆的描述與治理建言，抑或對於西行所經路程的比較與探討，或是對於中國邊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甚至關於作者本人及其父親、子嗣的考察都大有助益。二則本圖年代久遠，還極可能是海內外孤本。其三則是古地圖繪本技術難度高、數量稀少，流傳不易。身為傅圖一員，豈可不敬之重之？

筆者藉親身參與此圖重修裝裱之際，一并勾稽爬梳相關文獻，以期能對此圖及作者有一粗略瞭解。也許是地不愛寶，古物有靈，經修復後本卷基本完好，缺文僅約莫十餘，有學者認為「清代西域行記還未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相關研究比較薄弱。」<sup>49</sup>傅圖所藏這卷記錄著二百五十年前西域回疆風土民情的彩繪《萬里回疆圖》，甚至也從未被相關著作收錄或被學者加以利用，如今它又重現昔日光彩，盼今後能提供研究者更有價值的訊息與啟發。

<sup>49</sup> 謝娟燕，〈清代西域行記研究〉，頁2。